

[中华民族] [早期源流]

ZHONG HUA MIN ZU ZAO QI YUAN LIU
WANG YU ZHE ZHU

TIAN JIN GU JI CHU BAN SHE



王玉哲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中华民族] [早期源流]

ZHONG HUA MIN ZU ZAO QI YUAN LIU
WANG YU ZHE ZHU

TIAN JIN GU JI CHU BAN SHE



王玉哲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民族早期源流 / 王玉哲著. —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0696-738-6

I. 中… II. 王… III. 中华民族 — 民族历史 — 研究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8887号

中华民族早期源流

王玉哲 / 著

出版人 / 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j@tjabc.net

三河市富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9… 字数 280千字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696-738-6

定价: 48.00元

目 录

自序	(1)
导论	(18)
中国古史上的民族问题	(19)
一 什么是“民族”	(19)
二 汉族“古代民族”的形成、民族意识的发展 以及对民族意识的评价问题	(23)
三 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问题	(30)
先秦的“戎狄”及其与华夏的关系	(34)
一 “戎狄”观念的演变	(34)
二 “戎狄”与华夏文化上的差异	(41)
三 “戎狄”的分布	(45)
四 华“戎”由对立到融合	(51)
华夏民族	(56)
夏民族与夏文化	(56)
一 夏族主要的活动地域问题	(57)
二 “河南龙山文化”命名之不当	(63)
三 夏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仰韶文化的关系	(66)
四 夏文化有无铜器和文字的问题	(69)
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	(70)
一 问题的提出	(70)
二 商族起于东方的证据	(72)
三 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推测先商族的来源	(87)
四 小结	(90)

附：殷商疆域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点”和“面”的概念	(91)
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	(97)
一 小引	(97)
二 山西汾水流域自商至西周一直留有周族的根据地	(99)
三 姬姓之古国在山西者独多	(103)
四 姜姓之族原亦在山西	(108)
五 古有易与先周的关系	(112)
六 周原一地原在山西太原	(114)
七 先周族的迁徙是自东而西	(116)
附：沈长云《关于华夏民族形成的几个问题》	(118)
少数民族	(127)
鬼方考	(128)
一 鬼方、昆夷、玁狁乃三种不同之种姓	(128)
二 鬼方与商、周之关系	(131)
三 鬼方之地望	(136)
四 鬼方之后裔	(143)
附：鬼方考补正	(144)
1. 甲骨卜辞中有无伐鬼方的记载	(145)
2.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如何解释	(147)
3. 余论	(151)
玁狁考	(152)
一 绪论	(152)
1. 论鬼方、昆夷与玁狁	(153)
2. 卜辞中之邛方与玁狁	(155)
3. 有易、狄、玁狁、犬戎及“允姓之奸”	(158)
二 玁狁之兴衰	(163)
1. 有易与先商之关系	(163)
2. 克商前后周族与狄人玁狁之强弱转化	(166)

3. 夷、宣时之獬豸	(169)
4. 獬豸之后裔	(174)
三 獬豸之地望及其出没地域	(182)
1. 獬豸的地域	(182)
2. 镐、方与莽京之关系	(201)
3. 与獬豸有关的几个重要地名	(218)
附：论西俞、高陶	(228)
附：西周地理及獬豸活动地域示意图	(249)
四 结论	(249)
附：獬豸兴衰一览表	(251)
楚族故地及其迁移路线	(252)
一 引言	(252)
二 楚族原于河南的推测	(253)
三 楚族的东迁	(258)
四 楚族徙居吴皖境的史迹	(260)
五 由古地名证楚族曾居苏皖境	(264)
六 从“太伯奔吴”与“楚攻徐偃王”二事证 楚族曾居苏皖境	(269)
七 楚族的西迁与越国的成立	(271)
八 结论	(275)
秦人的族源及其迁徙	(277)
一 秦族源于东方证	(277)
二 秦族西迁的时间和途径	(283)
附：周平王东迁乃避秦非避犬戎说	(287)
后记	刘泽华(295)

自序

先秦民族史写作的宗旨

“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结合着全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特征，既是统一的，而各个民族又都保持着各自民族的特色和社会结构。那么，这种类型是怎么形成的？经过了什么样的具体复杂的过程？必须从历史上去追究。又因为它根植于遥远的先秦时期，所以，对中华民族早期这段历史的深入研究，对理解我们中国的现实问题极有帮助。因而，对先秦民族史的学习和探索，也应当是当今史界一项严肃的历史任务。谚语有云：“知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此《中华民族早期源流》之所为作也。

一 “中华民族”的内涵

“中华民族”包括当今中国境内 56 个民族多元统一体的实体。这 56 个民族从历史上形成了他们之间既互相斗争、又互相依存统一，而又不能分割的整体。从远古的历史上看，在“中华民族”出现以前，中原及其周围地区，星罗棋布似的居住着无数的不同种姓的氏族和部落。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的高低各不相同。在夏、商、周三代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血缘关系密切和虽无血缘关系、而交往比较密切的氏族、民族，例如夏族、商族与周族三族，通过斗争和交往逐渐融合与陶铸，形成“华夏族”这一民族和文化圈。“华夏族”就是秦汉以后的“汉族”。

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圈也在同时或稍后的朝代里，以同样方式形成另一个或几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圈。同时也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在互相斗争中，从历史上消失了；又有一些新的民族出现了。所以，中国在各个时代中，民族成分是不同的。今天我们所谈的“中华民族”

或“中华民族文化”^①，应该是现代中国各族人民的祖先共同创造的几个文化圈之总和的统一文化。其文化源头因而是多源的。有的来源于华夏族，有的则发生于中国各时代的其他少数民族中。因此，说到“中华民族文化”的构成因素也是个多元的统一体，绝不是只由华夏人独创的，而是除了华夏族，还包含着有些古老的少数民族文化在内。许多古老的少数民族当时都有其自己的古老文化传统，其祖先也创造过具有其地方特性的古文化。后来这些古文化传统，在华、戎杂处的局面下，诸族文化互相交往、渗透、融合，逐渐演变形成了“中华文化”中的部分内容。“中华文化”这种“兼收并蓄”的特点，也是使“中华民族”之所以能长期永存的原因之一。

历史上各民族发展的速度、快慢不同，其跨入“中华民族”文化这个门槛的步伐，有先有后，但都以自己特有的文化传统组成并丰富了“中华民族”总的文化内容，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缔造者。

“中华民族文化”内，诸族只保持着相对的共同性，但各族之间同时仍保存着各自的相异性。大家均以华夏族的文化生活（语言、风俗、习惯、心理状态）为主干，长期的经济往来，构成较稳定的一种整体文化。尤其在秦、汉以来各世代中，中国就形成以汉族为主干的、比较稳定的共同文化。这些不同的民族，不管是在同一政权或在同时并存的其他政权下，各个民族为了共同利益和愿望，对这种相对统一的“中华文化”有意无意地产生一种一致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的心理，促使着同时并存的对立的政权，迟早也会逐渐统一起来。

二 文化上统一性的重要

从历史上看，文化上的统一对历史的发展、形成和定型起着重要的作用。最明显的如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形成“华夏文化”以来，经历了群雄并立的春秋、战国，走向秦、汉大一统的帝国，政治上完成了一统局面的定型。后来，虽然又出现过一度的分裂，如三

^① 关于“中华民族”或“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涵和概念，我们多采纳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和意见。见费氏所著《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新华文摘》1997年第6期。这是原文的简化稿。原文见于《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费氏的很多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国、魏、晋，以及稍后的五代、十国，接着又经历了辽、宋、金各代，都是几个不同民族政权同时并立。这时老百姓尽管居住在不同的分立国度里，他们所奉行的生活习惯却仍是同一个“中华文化”。所以，当时国家政权分裂，而“中华文化”仍是统一的。这种比较稳定的多民族共同的统一的“中华文化”，使他们为了共同利益有着浓厚的一致性和向心力。作为一个国家，政治上当然需要统一，而政权上的统一则必须有文化上的统一作为后盾才能巩固。因而，文化上的统一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亚于政权上的统一。而文化上的一统，是历史上通过民族间的交往而自然形成的。

三 “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多元统一体的形成

任何一个民族的形成，其成员对其本族共同体必须有一种强烈的“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一体感。凡属于同一个民族的人们的认同感和一体感，是这个实体在人们意识上的反映，这就是“民族意识”。

“民族意识”的定义，最初是从苏联引进来的，经过中国人的加工、改进而完成。最初苏联人的定义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苏联传入的这个定义有其优点，但也含有不妥之处。如其中的“共同地域”就是一例。因为提出“共同地域”极容易与“国家”的特征相混（因为“国家”是和领土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近年来西方有些地区、国与国之间因此就出现了一些民族纠纷，民族战争连绵不断，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费孝通先生建议对从苏联输入的这个定义加以修正，用“民族聚居区”代替“共同地域”^①，这就免除了这个后患。

“中华民族”包括中国境内 56 个民族的实体。依据费孝通先生的说法，也不仅仅是 56 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而是指这 56 个民族从历史上已经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其中每个人都视为“我们是中华民族”，都有这个“共同意识”，也就是：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情感和道义。56 个民族之间当然也有矛

① 参看费孝通：《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新华文摘》，1997 年第 6 月期。

盾。因为各民族之间，语言不同、生活习惯有差异，“差异就是矛盾”，这只是内部矛盾，是对立的统一体。这个多元的统一体，通过多年来的矛盾与交往、逐渐互相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个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形成了现在这个“中华民族多元的统一体”。

四 对学术上不同的争论应正确对待

“民族”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从史学上说，它又是个复杂的学术问题，是需要通过大家研究、集思广益，才能正确解决的。本书《中华民族早期源流》是笔者对先秦民族史长期从事研究、提出的一部较有系统的学术论著。它既不是单纯的论文汇集，也不是一部对中国所有的民族，面面俱到、系统的民族史，而是多少保留着若干学术研究的痕迹。笔者对先秦史较重要的几个民族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自成一家之言。因而所见每与时贤不同，有些浅陋或错误的论点，必不可免。所以，我诚恳地欢迎学术界提出讨论或批评指正。

任何一种新学术观点的出现，在开始时难免有一些不成熟之处，但新的说法与传统的说法不一致、甚至互相抵触，这也是科学研究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或者说也是应当出现的现象。当然，对过去已经明确的学术结论或历史规律，我们必须予以充分尊重。但是这些旧的学术结论或历史规律，当在新的情况下或新发现的资料前，似乎已不能用旧的结论或说法去解释时，应当允许提出修正意见。纵使新的修正意见还不够成熟、圆满，也应当允许其存在，留待以后补充。对那些与传统的结论相反或抵触的新说，一般的说，不只是应允许人家存在，而且应当欢迎新说的提出。因为任何科学的发展或进步，必须通过“百家争鸣”，才能发展壮大。若长期舆论一致，死水一潭，学术是不会向前发展的。

也会遇到另一情况，有时即使作者本人对自己新说有较大的信心，也不能担保它能得到所有读者的赏识。因为在不同的人的眼里，对同样材料可能看成一幅不同的图景，作者和读者不可避免地要随时受到个人先入为主的成见和个人感情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看法。本书所用的研究资料，在别人手里，也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处理和应

用，而且也很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可能有一方的作者对材料的处理有所不当，而不知不觉造成了分歧。所以，对不同的看法，总是要抱以欢迎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人家接受你的新说很难，有时甚至要求人家平心静气地来讨论，也很不容易。只要读者能耐心地阅读完笔者的论点，并对本书作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和评价，我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本书个别章节写于几十年前，当时的提法有的不妥当，或征引有错误，后来有的已经陆续随加改正。还有些论点，过去颇自矜为新创，但在正式公布之前，却发现已有人先我而发之。自己深喜与时贤遥符冥契，然其论点既与余说一致，乃将余说径自删去，而改从之。若偶对余说保留，则必将人家说法加以注册，以避有掠美之嫌也。

钻研古史越深入，越感到其无尽无休。余幸生于诸同道学者之后，能得据人家之成说以推其未竟之绪。然此稿整理甫就，仍有旋觉其误，其不自觉而有待纠正、补苴于后人者，殆必有倍蓰焉！对自己的点滴成说，岂敢侈望以自足邪！

本书所讨论的四大问题

本书讨论的是先秦民族史，其中疑难问题太多，我们只能重点地挑些与传统看法不同的部分问题，提出来向读者请教。

一 夏、商、周三族是同时并立的三个氏族

我们认为：夏、商、周三代是同时并立的三个不同的氏族或民族，他们只有势力大小的不同，没有像后世朝代那样的君臣、服属的上下级别的关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我们读“夏文化”时，必须先把“夏族人的文化”与“夏时的文化”两个完全不同的内容和概念分清楚，以免在讨论时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争论。比如，有人认为：夏族人、先周人当时还没有产生“文字”和“青铜器”（我就是这种主张者之一），可是却有人不同意。他们举出一些商朝建立以前的先商已有原始文字和原始的青铜来，认为这些不是在夏时已产生了文字和青铜器吗？我们说“对，这些文字和青铜器确是夏时的文化，确是夏

朝那个时代的先商人创造的文字和青铜器，但并不是夏族人的文化”。“夏时”和“夏族”是内容不同的两个概念。

二 研究历史问题，不要孤立地只从一个问题看，要尽可能地与有关联的其他历史问题互相比证

在处理某一历史问题时，有时只孤立地看这一问题，似乎可通，但与有关的其他问题，比而观之，往往乖戾自见。例如有关先周人原先居地，传统的说法认为自始一直在今陕西渭水以北；但也有人认为在今之河东汾水流域。我们采纳并也主张这后一说法，认为是正确的。因为今汾水流域不但存有大批史料可以证实，而且在历史上先周族是夏族的一个分支，夏族原本在今山西省的南部，说先周族原亦在今山西省的南部，不是更顺理成章吗？殷商末年周人因与狄人（獫狁）有矛盾，才从汾水流域西迁到今陕西的岐山。这不是也很容易理解吗？

再有就是我们认为西周时的獫狁（犬戎）居地在今山西省南部。这也是通过排比其历史发展及其与先周族原居地同在晋的史迹，及西周王室与獫狁历次战地以及犬戎在《穆天子传》^①中反映的犬戎居地等等，互相联系，一以贯之。很自然地说獫狁居地当西周时期是在晋地，而不是旧说多谓在陕、甘之间。这也是从诸种历史事实证成一史实的实例。用这种从互有联系的诸史证成一史的方法，所得之结论理应较为真实可信。

《诗》谓“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太原的地望在哪里？经学家、史学家争论千百年，一直纷纭莫定。其实西周时的太原在河东，把有关周族与獫狁的历史一排比，即可得出。这又是一例。

又如姜姓与姬姓的周族，由来就关系密切（自始祖开始就是姜、姬通婚），历史上姜姓的齐、许、申、吕四国，我主张原本就与先周族同居山西南部的太岳（今霍太山）附近。许、申、吕三国在周宣王时才从山西南部迁往河南，史有明文。这也是用互相联系的方法得

^① 按《穆天子传》与《古本竹书纪年》同出汲冢，大概同为战国时代记述的古史作品，同有其一定的史料价值，《穆天子传》中除去神话部分外，仍存有可以征信的资料。

出的。

三 《易经》称“（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如何正确地解释

《易经·既济》的“九三”爻辞：“（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这句话关系到殷商时鬼方势力大小的问题。据千百年来传统的说法，是指在殷王最盛时期武丁对鬼方打了三年的战争，才把鬼方攻克。足证当时鬼方是殷商时一个强大的敌国。但是，在出土的大量甲骨文中，所反映的鬼方却极小。一个弱小的小方国，同强大的商王作战，绝对不会出现打三年的大战役。由于地下的卜辞与文献上记载不一致，于是使有些学者造出一些另外的错误联想。其实，文献上的记载与卜辞上记录的内容是相合的，两者并无分歧。只是过去人对“三年克之”的“三年”解释错了。

按《易经》的“三年”，不是指打了三年的仗，而是说，在高宗即位的第三年中，与鬼方进行的那一次战争，攻克了鬼方。

这是依据古文献现有的最早的历史记录的体裁，大多是纪年体。我们曾对比了其他的古史纪年，发现这条《爻辞》应当是记录攻克鬼方的时间，是在殷高宗在位的第三年中，而不是打了三年的仗。我们在本书中列举了大批证据，读者阅读后自会明白。

四 西周末年秦族与西周王室从服务、友好转变为敌对、仇杀的关系

西周末年周幽王嬖爱褒姒及其所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宜臼的母亲申后（申侯女），改立褒姒为后。太子宜臼怕被杀，乃逃奔其舅父申侯之国。这时周王室由于后位、太子更替事件，王室内讧，分裂为敌我矛盾的两方：一方是以周幽王为首，包括褒姒及其子伯服、卿士虢石父和“将兵救周”而且战甚力、“有功”的“秦襄公”等（参看《史记·秦本纪》）；另一方则是以太子宜臼（后来的周平王）及其母申后为一方。拥护他的而且有兵权的包括其舅父申侯、同盟军缙与犬戎等。双方打了几场恶仗。史载秦襄公出兵救周幽王，对周王室有功，是站在幽王、伯服一方，而与太子宜臼（周平王）处于敌对的地

位。两方敌友分明。

经这么一分析，太子宜臼与犬戎是友邦，而非敌人，而史公《秦本纪》则说周平王避犬戎难，东徙洛邑。并且犬戎居地在晋境，距东都比西京还近。周平王避犬戎为什么不西避，反而东迁更近犬戎之地？秦襄公是助幽王往杀太子宜臼的死对头。而史公却称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而又称平王封襄公为诸侯？你看这有多大的矛盾？

我们考察秦襄公过去列祖辈，从孟增开始，差不多世世都效忠周王室，秦襄公在周幽王时必然也是效忠的。史载其将兵保驾，抗击太子宜臼、申侯、犬戎之合兵。在幽王被杀，申与犬戎乃“取周赂而去”。这时宗周畿内必然成了秦襄公的势力范围。太子宜臼因惧怕秦兵，当然不敢再回西京建都，乃从申国联兵的武力返申暂立国，再从申北迁洛邑建都。

上面只简单地对这四大问题提出来，要想详细地了解内容，只有请参阅本书有关的章节了。

中国这一文明古国能长期生存、发展的原因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文明古国，而且又是在世界诸文明古国中，唯一持续延长、未曾中断的一个文明古国。这与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罗马等文明古国不同。中国至少从大约公元前 2070 年^①的远古时期，经过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一直发展到现在，没有中断过。而且又有与此时间并行记录的一部庞大的二十四史等古文献遗存。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中华民族久已号称具有五千年的历史，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确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坎坷不平、艰苦奋斗中走过来的。尤其近百年来，遭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出现了一连串的“国难”、

^① 1996 年 5 月，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科技测年学等学科门类 200 多名专家学者联合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目标攻关、交叉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以不同的方法进行全面的研究。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对研究成果“夏商周年表”在新闻发布会上已正式宣布。详情请参看：《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0 年 10 月版。

“国耻”，把中华民族压得喘不过气来。

今天，中华民族已从长期挨打受气、抬不起头来的状态下站立起来，能与世界诸先进强国平起平坐了。过去一些世界文明古国，有的先后退出历史舞台，而中华民族这一文明古国，虽然也经历了一段曲折过程，但一直走到了今天。中华民族所赖以能长期生存发展的原因是什么？经过我们的研究探索，至少有下面三个方面的原因，起到重大作用。

一 西周的“天命观”的优越

西周时人的“天命观”是在殷人的“天命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产物。从殷墟卜辞中看，殷人最高的天神是“上帝”，上帝具有无限权威，她掌握着世间人的一切吉凶祸福。所以，殷人对上帝非常敬畏。为了趋吉避凶，他们对上帝经常祭祀^①。殷人心目中的“上帝”，只是殷族人的保护神，始终没有超出宗族神的性质。有时对异族也不是漠不关心，但总不能与对殷族一样一视同仁。所以，殷人的“上帝观”，多少含有排外性质^②。

周族以“小邦周”却能一举而战胜大邦殷而有天下，万能的上帝为什么没有对殷商加以保护，而却改为保护周了呢？再从历史上夏、商、周三代的更迭上看，上帝最早既然把“天命”给了“夏”，为什么后来又改给了“商”？而现在又改给了我们“有周”呢？可见“天命”是无常的。《诗经·大雅·文王》就明白地说过“天命靡常”。周人这时已认识到，“上帝”不是一族的宗族神，而是对所有夏、商、周以及其他族的氏族负有保护的责任。周人心目中的“上帝”，便由殷人含有排外性的“上帝观”，逐渐发展为具有兼容并包、开放性的“上帝观”了。这是一个大的突破。“上帝”对诸族的保护，一视同仁，都负有保护之责。不过对保护的对象还是有选择的。从《尚书·多方篇》可以看出，周人认为“上帝”因为看到夏朝末年的王，骄奢

① 参看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402—407页。

② 参看许倬云：《西周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10月版，第309—311页及第96页。

淫逸，于是便废除了夏的“天命”，改令商的成汤革夏命而天下，并历有年所。可是到了商的末世，商王也走向不注意天道和民事。“上帝”于是对殷不再保护。周人这才奉“上帝”之命“割殷”，把“天命”又给了周。足见“上帝”只保护那些畏“天命”、勤民事、行德教的王。如国王一旦陷入淫逸昏虐，则天必降下灾难，并将王位转与他姓之“有德者”。所以必须顺着“天意”，也即是顺着“上帝”的意旨办事，才能得到上帝的保护。

但是，“上帝”之为物，谁也看不见、摸不到，如何探知他的意旨呢？西周人认为当时部分哲人已体会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①，“民之所欲，天必从之”^②，“上帝”的意旨来自民意，天是跟着人民走的。这里的“天”也就是指“上帝”。意思是说，凡是“老百姓”想要做的事，“上帝”一定答应去办。一直到春秋时，还有人说，“夫民，神之主也”^③，认为“神”是依民而行的。可见“上帝”与“民”是息息相关的。做人民首领，只要体察民情，重视民意，做到保民，就能得到“上帝”的保佑。

但是施行什么样的政策，才能算是重视民意和保民呢？周人提出就是合乎“德”的政策^④。如周公在封康叔于卫时所作的《康诰》的诰辞中，就明确地提出要康叔实行“明德慎罚”。在《召诰》中周公、召公再一次地诰以“王其疾敬德”。又举史例谓夏之末世，因“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又谓殷之末世，也同样由于“不敬厥德”，同样地走向“早坠厥命”。这样反复强调行“德”政的重要。

周初一些先进首领们所谓的“德”政是什么呢？已有些学者曾归纳周初有关史料，认为不勤政、不爱民、不敬事祖先、不重用老成典型，而只荒淫奢侈，这就是“失德”、“无德”；那么，反转来说，勤政、爱民、敬事祖先、重用老成人等也就是有德的“德”政的思想内

① 见于《孟子·万章上》引《泰誓》语。

② 见于《国语·周语》所引《太誓》；《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穆叔所引《大誓》及昭公元年子羽所引《大誓》都是同一语。

③ 《左传》桓公六年随国季梁语。

④ 见《尚书》的《康诰》、《梓材》、《召诰》、《多士》、《君奭》等篇。

容了^①。

其实“德政”简明地说，就是爱护老百姓的政策。这可以从“民情”中反映出来（《康诰》中有“民情大可见”）。所以周公在《酒诰》中诰诫康叔曾引古语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从“民情”、“民监”中可以知其是否“德”政。

从西周人“天命观”认为周人心目中的“上帝”已超出了殷人那种狭隘的宗族神的性质，而扩大、开放到保护天之下所有族类。在这种“天命观”引导下制定的政策，出现了“上帝”保护行德政、爱民的人，把“天命”与“民情”联系起来，自然就扩大了团结面，使很多族众、不管你是哪一族，只要你顺从德政，就能被凝聚在一起。团结、友爱自然比分裂、仇视要好。所以，周人“天命观”的优越和进步性是极为明显的。

二 周之“宗盟”组织代表进步方向

西周、春秋以来，周人为了团结更多的群体，除了用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组织”把姬姓同族的人群组成一个大的群体以外，最重要的还创造出一种“宗盟”组织，用以团结那些与周没有血缘关系的其他群体。“宗盟”组织不知初起于何时，至少自周时即已广泛流行了。用这种组织去团结，不是靠血缘关系，而是依靠向鬼神盟誓，请鬼神作保证。《礼记·曲礼下》曰：

约信曰誓，涖牲曰盟。

《疏》解释说：“盟者杀牲歃血，誓于神也……盟之为法，先凿地为方坎上，割牲牛耳，盛以珠盘，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为盟书，成乃歃血而读书。”这些解释对盟誓说，大致是可信的。其实这种类似的社会风俗，以后历代都在流行。例如三国时刘、关、张桃园结义就是个典型。旧社会称之为“拜把子”、“拜盟兄弟”。从社会学、历史学上看，社会越是原始、时代越是远古，这种组织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就越大。古人质朴，重视盟誓，已诺绝不反复。尤其在结盟仪式上多含有一些迷信色彩。近现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还流行着一种用“吃

^① 见斯维至：《说德》油印本。